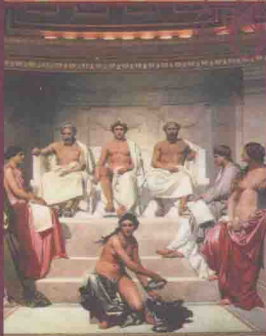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
• 大学之道丛书 •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美国大学之魂

(第二版)

[美] 乔治·M. 马斯登 (George M. Marsden) 著
徐 弢 程 悦 张离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美国大学之魂

(第二版)

[美] 乔治·M. 马斯登 (George M. Marsden) 著
徐 弢 程 悦 张离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56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大学之魂/(美)马斯登(Marsden, G. M.)著;徐弢,程悦,张离海译.—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

ISBN 978-7-301-25048-8

I. ①美… II. ①马… ②徐… ③程… ④张…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773号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Copyright © 1994, 1996 by George M. Marsden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4.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美国大学之魂》的英文原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印于1994年。

- 书 名 美国大学之魂(第二版)
- 著作责任者 [美]乔治·M.马斯登 著 徐弢 程悦 张离海 译
- 丛书策划 周雁翎
- 丛书主持 周志刚
- 责任编辑 周志刚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048-8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33.5印张 43.3千字
-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7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美国高等教育：从宗教走向世俗（代序）

林 伟



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的名著《美国大学之魂》着眼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大学的历史变迁，探析了原本浸透宗教精神的高等教育逐渐走向世俗状态的路径。这部著作一经出版，竟在美国图书市场上创造了学术著作畅销的奇迹。其背后原因不乏当代美国基督教意识的隐隐复兴，亦与作者立场鲜明、敢于破除窠臼的新观点直接相关。

兴起于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高等教育，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与蓄力，终于在 19 世纪晚期以降的几十年间在美国社会完成世俗化

一般认为，所谓世俗化就是宗教仪礼与精神在社会生活以及个体世界中的淡化和退隐。根据经典社会学的理论，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机构，在现代社会中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地位。因此，考查大学的世俗化路径无疑对于理清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价值。

西方谚语有云：“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进步史学为我们描绘了一场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战斗，最终的“胜利者”——科学把持了有关世俗化的解释话语。在这种话语的支配下，世俗化被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中一股不可避免的浪潮，它兴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与蓄力，终于在 19 世纪晚期以降的几十年间将浸透宗教精神的美国社会彻底倾覆为世俗的世界。



在高等教育世俗化的问题上,“二战”之后美国历史学界的翘楚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为学界订立了一种颇富解释力却又逐渐被大家怀疑、批判的传统模式。霍夫施塔特以内战为界将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划分为学院时代和大学时代。学院时代的主导是由各个教派创立的学院,它们服膺于宗教的目的,其教学内容与活动无不充满了宗教的底蕴。与学院相对,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大学则是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无论是在查尔斯·埃利奥特治下推行选修制的哈佛大学,还是按照德国大学模式于1876年创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它们都是世俗化过程中科学原则战胜宗教的象征。

正是自由派新教扮演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特洛伊木马”,在其主导下,美国大学逐渐过渡到观念世俗化,并最终将新教精神与原则彻底边缘化

针对霍夫施塔特等史家所主张的“革命模式”的高等教育世俗化理论,美国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渐起批评之声。在修正传统史学方面,具备相当学术水准的一系列著作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其中就包括马斯登的《美国大学之魂》。马斯登开门见山地将其思考与尝试解决的问题呈现了出来: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与基础原本是那些尊奉新教教派精神的学院,直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学院仍然保留了明显的宗教信念,但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学课堂却已然将新教的教义排斥在外了?

马斯登摒弃了传统史学强调科学与宗教冲突的功能主义解释模式,着力于从新教内部找寻历史演变的线索。他首先指出,19世纪后期逐渐确立的新教无宗派主义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开启了一条通路。19世纪前期,北美大陆上宗派林立,各个宗派都将建立学院、培养人才作为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教派竞争加剧,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宗派主义的排他精神不利于美国社会的发展。于是,倡导无宗派主义的自由派新教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其精神特征正是神学原则上的包容性和宽容性。在此后的美国大学创建过程中,自由派新教徒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其精神原则也渗透到了大学的目标与制度之中。

马斯登认为,正是自由派新教扮演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特洛伊木马”,在其主导下,美国大学由“方法世俗化”逐渐过渡到了“观念世

俗化”，并最终将新教精神与原则彻底边缘化。19 世纪末的大学创建者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都试图通过大学对科学方法的追求来改进僵化的宗教。这些校长们普遍认为，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科学自然主义原则非不会对基督教精神造成威胁，反而可以作为完善信仰的有益补充。

20 世纪初，在自由派新教的内部推动下，加之社会对科学的普遍乐观精神，宗教信仰逐渐退隐到大学的神学院之中，成为专业化神学研究的领域。与此同时，美国大学校园里信守多年的强制性祷告仪式也最终诉诸于个人自由，宗教的课程更是被较为实用和世俗的道德哲学所取代。可是，试图从方法上改进新教信仰的努力却最终失败了，马斯登将其归因于自由派新教内部难以化解的矛盾。终于，在大学的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弥漫着一种对宗教的普遍冷漠，几个世纪以来被奉为大学灵魂的基督教精神最终消失了。虽然一些保守的基督教派和人文主义者都曾经尝试为美国大学重新找寻某种灵魂，但是这些努力最终都没能取得成功。

马斯登着力考查自由派新教精神主导下的美国现代大学的演变，实质上是为研究高等教育世俗化问题找到了一个可以撬动旧有观念世界的杠杆

有学者指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学界，马斯登的《美国大学之魂》连同茱莉·罗宾的《现代大学的形成——知识变革与道德的边缘化》，以及道格拉斯·斯隆的《信仰与知识——新教主流与美国高等教育》三部著作都是旨在从知识与信仰的交互关系角度，重新探讨美国高等教育世俗化路径的代表性研究。纵观三部著作，虽然角度有异，但是思路大致相同，结论也都注重强调世俗化过程的复杂性。

高等教育的世俗化问题牵涉颇广，直接来说就与西方大学的传统、高深学问的根本属性、宗教信仰的现代转型、科学观念的动态演进等诸多要素交错关联。从这个角度而言，马斯登着力考查自由派新教精神主导下的美国现代大学的演变，实质上是为研究高等教育世俗化问题找到了一个可以撬动旧有观念世界的杠杆。

此外，在《美国大学之魂》一书中，马斯登非常明显地将自己的研究立场与目的表露出来——要在日益多元化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为宗教活动与研究争取更大的空间。这种鲜明地彰显研究者的意图，

显然是受到了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新左派与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不过,马斯登所采用的论辩性的研究立场同样招来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若将公正这则基本的治史准绳置于主观的价值取向,难免会在某些历史因素和事件上产生遮蔽与误读。

不管怎样,《美国大学之魂》一书从有别于传统史学的角度书写了美国高等教育史,这为拓展和丰富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值得深入探索的路径。同时,对于作者所彰显的研究意图与立场,我们大可以采取一种包容性的态度。毕竟,对于当下的美国高等教育而言,多样性或许已经成为最显著的特征,如果马斯登所诉求的目的能够得到认同乃至实践,这未必不是一种尝试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平装本序



任何作者都不希望自己的著作遭到忽视,所以我既要感谢那些赞同本书观点的人所付出的热情,也要感谢某些反对它们的人所付出的精力。如此热烈的讨论本身就足以证明本书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因为关于宗教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的争论仍在持续。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本书将以一个能够被更多读者接受的价格得到出版。

虽然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历史研究,但是很多评论者却更为关心它那“非科学的最后附言”。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有时候把这篇附言视为了“一条挂在长达 400 页的正文后面的、只有 16 页长的尾巴”。我对这种评论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不希望自己的历史观点遭到忽视。另一方面,这篇附言又与前面的论述密切相关,而且我高兴地发现,它们的结合有助于激起某些严肃的讨论来澄清宗教信仰与学术活动之间的关系。我已经收到了不少与此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我写了一部简短的续集——《难以容忍的基督教学术观念》(牛津,1996)作为这篇附言的拓展。

虽然我认为自己必须通过大量描述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大学在 19 世纪晚期的创建过程来支持我的历史观点,但是我知道由此导致的冗长可能会吓跑某些读者或者妨碍本书的课堂应用。因此,如果有的读者希望找到更加简短的相关描述,我建议他阅读一下本书的绪论、导言、三个部分的介绍,以及它的第 3、4、6、7、9、10、14、16、18 章和后记。其他九个章节同样探讨了一些重要的主题和有趣的事例,我希望它们能够引起大多数读者的兴趣,但是本书的精简本同样自成一体。

乔治·马斯登

1995 年 11 月



序



为了使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变得易于理解和研究,我按照大的主题着重考察了美国的主要大学及其前身的关键历史时期。因为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大学为其他大多数高等院校树立了典范,所以我着重考察了这些具有开拓性质的大学。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读者而言,这种做法都可以使资料变得易于处理,尽管它也意味着许多事件将遭到省略。例如,我没有过多地讨论那些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还保持着基督教特色的、成百上千的小型宗教学院,虽然这些学院是大学式教育的重要补充。我的兴趣在于那些最终决定了大多数宗教学院的发展前景的大学,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为其他的学院培养教师。

我也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天主教的学院和大学上,因为在美国的学术生活中,它们同样没有确立多少主导性的准则。长期以来,女子学院、非洲裔美国人学院、大多数南方学院和大学以及保守的新教学院都被边缘化了,造成这种边缘化的原因来自那些在美国的学术生活中确立了最重要的准则的大学。尽管前者可能在它们自身的领域里有着相对出色的表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未能涉足划时代的学术活动。虽然宗教在这些院校中的历史影响可能有着其自身的魅力和价值,但是它们并非美国大学历史的核心。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描述出这些院校的边缘化的意义。同样,虽然我没有密切关注为数不多的犹太教育机构,但是却着重描述了犹太人的作用在 20 世纪的大学中的快速增长以及新教对此做出的反应。

任何一部讨论美国大学的起源的历史著作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外来的模式创建的,尤其是按照英格兰、苏格



兰和德意志的模式创建的。任何一份关于宗教在现代大学中的影响的历史记录都必须提到上述国家的文化和大学的基督教化与非基督教化,并且将这些过程与美国的发展相对照。如果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发展时能够考虑到那些融入了美国历史的外来因素,我们将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其他的東西。

因为本书所叙述的主要是新教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创建过程中的影响,所以它要考察的历史主要限于新教建制尚未受到撼动的时代。它论述的重点是美国高等教育得以基本成型的 19 世纪晚期,不过它也回顾了美国高等教育得以起源的殖民地时期和 19 世纪早期,并且一直追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最后一章从总体上描绘了这些历史的当代意义。

正如我在绪论中指出的那样,本书的主要兴趣是探讨宗教观点为什么可以影响到大学的学术活动。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个具有启迪性的方面,那就是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几乎完全局限在本科教育以及大学的神学院当中,而在研究生教育和其他专业教育中却几乎乏善可陈。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最有意义的说明;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的宗教影响几乎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所以我们很难对它的极端重要性加以相应的探讨。

我对大学里的神学院的重视也微乎其微。因为我的兴趣是探讨当代美国学术活动中的主导因素是如何在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上,把宗教观点排除在大学的其他部分之外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它们的兴趣局限在神学院里。例如,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杜克大学等几所高校都曾把神学院视为它们的组成部分,尽管是次要的部分。然而,即便在这些神学院的鼎盛时期,它们的存在对于大学的其他部门而言也是反常的和令人困惑的。况且只有少数几所美国大学拥有神学院。因此,尽管大学神学院的历史具有自身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它们所服务的教会而言,*但是对于美国学术活动的核心特色的形成而言,传教活动和神学教育都未能发挥持

* 百合基金会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来研究这些机构,这种研究对于探讨美国新教的主要派别的历史很有意义。特别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格伦·米勒(Glenn T. Miller)的《虔诚与理智:战前神学教育的目标与目的》(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0),以及康拉德·彻丽(Conrad Cherry)即将付梓的作品《奔向天国:大学、神学院与美国新教,1880—1980》,她曾经慷慨地让我参阅了该书的初稿。

久的影响。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仅仅把次要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服务于大学社团的民间宗教的作用上。尽管这样的宗教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与大学的主要事业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从宗教的角度看,我们不妨认为宗教关怀被有效地排斥在现代大学生活中的最有影响的领域之外,而它们则对这种排斥做出了有意义的补偿。

因为本书所涵盖的面十分广泛,所以尽管我做出了这些限制并且总是力所能及地寻找原始资料,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借助了二手资料。当然,我利用二手资料的主要目的是想尽可能地保证本书的综合性。我在注释中列出了大量的二手资料作为相关问题的参考书目,它们说明历史学界的同仁使我受益匪浅,并且表达了我对他们的工作的感谢。在我的所有作品中,本书最能使我认识到学问是怎样从各种各样的学术交流中脱颖而出的。

乔治·M. 马斯登
圣母大学,印第安纳
1993年7月

致 谢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是帮助我进行直接的学术交流的主要机构,而本书正是从这种交流中产生出来的。他们长达四年半的慷慨资助使我得以聚集一批有才华的学者,而就是这批人为本书提供了研究基础。这家信托基金会的宗教项目部负责人马丁·垂伯和约耳·卡彭特分别对这项研究计划的发起和后来的监督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还要感谢罗伯特·林恩,因为他在百合基金会(Lilly Foundation)工作期间把这项研究计划推荐给了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在为这项研究计划做出了贡献的合作者中,我最感谢布瑞德利·朗费尔德。作为我在这项研究中的主要合作者,他以一位顾问、伙伴和朋友的身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达里尔·哈特对本书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担任了一年的合作者并且在随后担负了顾问工作。我特别感谢他从繁忙的日程安排中挤出时间向我提问,有时候甚至是在杜克大学高尔夫俱乐部这样的地方为我充当无偿的顾问。保罗·克门尼在担任我的合作者期间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需要感谢的合作者还有黛安娜·巴特勒、斯科特·菲利普斯、菲利普·高夫、莉斯·贺克森、托尼·耶金斯、凯瑟琳·朗、罗杰·罗宾斯和杰弗里·提克斯勒,他们都向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我要再次感谢杜克大学在1990年春季举办的学术会议参与者以及《高等院校的世俗化》(乔治·马斯登和布瑞德利·朗费尔德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的撰稿者。我尤其要感谢杜克大学为我的研究计划提供的经费和支持。杜克大学神学院院长丹尼斯·坎贝尔对这项研究计划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和鼓励,他使我受益匪浅。克莱拉·戈德温和她的助手谢尔



比·沃伦总是热情而有效地为我管理经费开支。在我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系为我提供了为期一年的交流机会,我得以与该系的同行进行有益的合作,我对此表示感谢。圣母大学、弗朗西斯·麦卡兰尼主任和他的家族为我完成这项研究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许多有影响的学者曾经评价过本书的初稿。其中包括达里尔·哈特、保罗·克门尼、布拉德利·朗费尔德、亨利·梅、马可·诺尔、乔治·劳力克、温顿·索尔博格、詹姆斯·特纳和格兰特·瓦科尔。我深深感谢他们所给予的建议、鼓励和编辑意见。在我从事这项研究期间,亨利·梅一直是我的朋友和非正式的顾问,他还是一位最认真的批评者和本书初稿的编辑者。乔治·劳力克也给予了我可贵的友谊、鼓励和忠告。我还要感谢圣母大学的研究生斯科特·菲利普斯、约翰·哈斯、迈克尔·济廷和比尔·斯韦尔莫等人所做出的有价值的评价。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辛西雅·里德又一次对我的写作风格提出了极好的建议,这已经超出了作为一名资深编辑的她所应尽的义务。我也要感谢卡罗尔·施瓦格的编辑工作、卡伦·约旦的校对工作,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欧林和保罗·斯考霍尔的巨大帮助。格雷格·马斯登为我打印了本书的校订本。布莱勒对我的帮助是独一无二的。潞西对我的帮助是无法估量的。长期置身于这样一种友好的关系之中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写作本书的岁月是我所经历的最美好的岁月之一。

“令人费解的学术自由观念”是我在1992年为美国教会史学会发表的主席致词,这篇刊载在《教会史》第62期(1993年6月)上的致词是从本书中提炼出来的,尤其是从第16章和后记中。

目 录



绪论 / 1

导言一 上帝与耶鲁的巴克里(1951) / 8

导言二 亨利·斯楼恩·科芬的耶鲁(1897) / 16

导言三 一所“基督教学院”? 诺亚·波特与威廉·格拉姆·
萨姆纳的耶鲁(1879—1881) / 21

第一部分 新教无宗派主义的确立 / 29

1 基督教王国的负担:17 世纪的哈佛 / 31

2 新的科学女王与新的共和政体 / 48

3 两种宗派主义 / 72

4 一种辉格党式的正义舆论 / 84

第二部分 科学时代的美国大学之定义 / 105

5 美国的实用与德国的理想:对改革的两种设想 / 109

6 科学时代的基督教遗产 / 122

7 诺亚·波特治下的耶鲁:积极的基督教与实证主义 / 134

8 加利福尼亚: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成分的革命 / 146

9 霍普金斯大学的方法世俗化及其基督教原理 / 164

10 密歇根大学的自由派新教:带来了杰斐逊主义的后果的
新英格兰动机 / 184

11 哈佛与人道宗教 / 201

- 12 在普林斯顿坚守 / 219
- 13 使世界免受传统建制的危害 / 247
- 14 低教会派的大学理念 / 267

第三部分 当联系切断之后 / 299

- 15 旧式的宗教所带来的困扰 / 301
- 16 令人费解的学术自由观念 / 330
- 17 基要主义者的威胁 / 359
- 18 基督教的生存障碍 / 377
- 19 局外人 / 406
- 20 寻找一种灵魂 / 420
- 21 一个拥有国家灵魂的教会 / 443
- 22 没有新教的自由派新教 / 464

非科学的最后附言 / 488

中英译名对照表 / 505

译者后记 / 514

绪 论



本书要探讨那些具有开拓性的美国大学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它尤其要从宗教的角度思考它们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那些在 19 世纪晚期为美国大学制定了最初准则的人是在强大的新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大学的建立者大都是活跃的新教徒,有不少还是忠实的信徒。虽然他们没有严格恪守自己的先辈所信奉的福音派*传统,但是他们依然献身于基督教的自由主义。在第二代、第三代美国大学乃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美国大学之中,几乎每所开拓性大学的领导者都具有新教背景,都拥有新教精神所塑造的观念,都时常赞美他们的基督教传统。

在美国大学得以形成的 19 世纪晚期,北方主要宗派的新教教义在实质上充当了宗教与文化的法规。这种国教思想在美国大学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因为正如你们所料想的那样,美国大学在创建之初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俗机构,而是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新教的无宗派主义的影响力体现为宗教活动在大多数大学校园里的持续存在。例如,在 19 世纪 90 年代,几乎所有的州立大学仍然把去教堂做礼拜视为强制性的规定,有的大学甚至规定必须在星期天去教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官方的礼拜活动才逐渐变得稀少起来。同时,许多一流的私立大学仍然保留着基督教的神学院,而且就在 20 世纪上半叶,它们还建造了一些华丽的教堂来表达对基督教传统的尊重。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不少一流大学的发言人还时常把他们的大学称为

* “福音派”(evangelicalism)这个词从未有过正式的定义,传统意义上的“福音派”指的是那些反对天主教并且注重重生得救的教义的新教教会和信徒。——译者注

“基督教的”机构。

这些新教建制的遗迹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令人感到好奇,而且是因为它们具有实践意义,但是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确切地说,它们为我们进一步发掘新教建制与美国大学的创建过程之间的广泛联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尽管美国在形式上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但是它的文化核心却始终为新教的教义所主导。早在19世纪上半叶,新教的领袖就已确立了他们的文化霸权。在这场文化征服中,他们的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在实质上取得了一切有影响的美国大学的控制权,包括州立大学的控制权。主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新英格兰移民在这项事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确立了其他人试图效法的准则。他们在政治上是辉格党人和后来的共和党人。作为清教徒的后裔,他们是把这个国家的崇高道德理想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热情和技术进步相结合的改革者。当他们在内战中取得胜利之后的那段时期,没有任何群体能够挑战他们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在教育上尤其如此。正是这份遗产的继承人——他们走过了惊天动地的民族冲突的时代并且继承了为上帝和国家服务的文化使命感——建立和主导了美国的大学。

当然,这些人所继承的传统和他们所建立的大学绝不仅仅是新教教义的产儿。它们同样反映了诸多实用性的、技术上的、专业上的和经济上的影响。然而,这些人是在一个充满如此强烈的国家道德理想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如果他们不从自己所继承的宗教传统出发来看待他们的实践目的,那么这种现象就值得思考。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所继承的基督教理想,而只是对这种理想加以调整,以便使他们的使命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尽管美国高等教育的形成有可能反映了实用性的影响和目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大学所代表的理想及其在实践中做出的选择都来自于一种强大而独特的新教精神。这一认识是具有启发性的。即便某些重要的教育观念似乎没有特殊的宗教色彩,它们也同样是通過美国的新教传统得以传播的,例如,来自启蒙时代的科学准则,来自美国革命的共和主义理想,个人发展的浪漫原则,或者美国人对于德国大学的理解等。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段历史,即思考这些大学借助新教传统做了些什么,而不是思考新教传统如何影响了这些大学,那么我们将马上发现一个惊人的悖论。美国的大学体系是在信奉福音主